

以影言志

——評吳國坤《昨天今天明天：內地與香港電影的政治、藝術與傳統》

● 秦 雪



區別於傳統電影史的研究方法，本書以電影個案的形式，輔以當代歷史脈絡和社會現實，討論電影作為普及的藝術創作，電影創作者如何直面電影的政治及社會功能，又怎樣面向觀眾。

吳國坤：《昨天今天明天：內地與香港電影的政治、藝術與傳統》（香港：中華書局，2021）。

一直以來，殖民時代的香港電影審查研究礙於文獻資料保密封存、缺失、散佚等原因停滯不前，未見重要的研究成果。直至近年，隨着英國及香港的檔案機構陸續解密並公開英殖時期的香港歷史檔案，已有學者注意到其中包含

昔日的香港電影審查記錄，並據此發表文章或論著，尤為引起學界注目^①。較早進行香港電影審查研究的學者如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院副教授吳國坤，其早年出版的多篇論文已經成為香港電影史、電影審查史相關課題的重要參考文本^②。吳國坤的新著《昨天今天明天：內地與香港電影的政治、藝術與傳統》（以下簡稱《昨天今天明天》，引用只註頁碼）收錄了多篇發表於中外雜誌的電影論文，代表了他多年來的研究成果（頁6），對於目前學界已有的中國大陸及香港電影史研究成果而言，具有難以忽視的學術價值。

《昨天今天明天》整合了吳國坤多年來輾轉於香港歷史檔案館、上海圖書館、倫敦國家檔案館和新加坡國家檔案館等蒐集的檔案及報刊資料，對陸港兩地電影史研究的向前邁進具有重要意義，也為後來學者的相關研究提供了文獻參照依據。作者在書中對中國大陸與香港的電影文化進行多層次、多向度的研究。區別於傳統電影史的研究方法，本書以電影個案的形式，輔以

當代歷史脈絡和社會現實，討論電影作為普及的藝術創作，電影創作者如何直面電影的政治及社會功能，又怎樣面向觀眾。作者自承對於當今學院盛行的文化研究「不大苟同」，認為其「大多偏重西方理論和文本的局部分析」，因而想「以電影研究來回應歷史」，從大量的電影資料中「探究其隱藏的政治、道德和歷史的『潛文本』(sub-text)」(頁26-27)。書中採取綜合式的研究策略，既有細緻的文本閱讀，也輔以翔實甚至不為人留意的社會史及電影史資料，為電影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維方式和理論基礎。

一 本書的內容

本書共有三個部分，主要討論涵蓋兩個方面：第一，探究「電影審查本身是如何成為一個等待解讀的文學文本 (literary text) 和歷史語境 (historical context)」(頁20)，傳達創作者的家國觀念、政治身份認同和藝術才華；國家權力如何利用審查構建文化的集體記憶，實現政治利益的最大化，以及在這一過程中，創作者與國家權利之間的博弈、共謀與曲線反抗如何實踐。第二，對電影的審查經常被理解為壓抑創作自由，強制刪剪和禁映更是被大眾理解成「閹割」、「抹殺」、造成電影文本的「缺失」。本書關注的是這些「缺失」的文本，如何經由翻譯、改編、翻拍等藝術創新的形式呈現在大眾視野中。創作者如何在審查的制約場域中不斷嘗試，更新創意，挑戰邊緣，

成就了先例典範，推動電影事業的發展。

(一) 民國時期的聲色政治

第一部分「子不語：民國電影的聲色政治」，聚焦在1930、40年代，以香港影人薛覺先、左翼影人蔡楚生和自由影人費穆分別在當時的電影檢查體制的控制下，以不同的電影創作嘗試平衡國家政治、藝術表達與票房利潤的關係。作者在第一章指出，薛覺先面對1930年代因批判粵語片市場化、缺乏道德使命感而引起的禁映風潮，創作了粵語片《白金龍》(1933)、《續白金龍》(1937)，兩部電影以戲曲與電影結合、跨媒體表演的創新嘗試大受好評，上映後風靡一時。學界對《白金龍》的討論已屢見不鮮，而作者獨具慧眼地從《續白金龍》的創作過程中，看到早期香港影人不向聲色政治低頭，努力捍衛粵語電影生存及發展空間的「香港性格」。

第二章轉向1940年代中國大陸的左翼通俗劇的討論，通過對蔡楚生、鄭君里導演的《一江春水向東流》(1947)與美國電影《亂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 1939)在上海上映時的宣傳、票房及受歡迎情況做對照，探究左翼影人直面國民政府的嚴格管控，以通俗劇的形式重現大眾的戰爭記憶，同時講述情感、倫理(頁49)。1949年前中國的私營電影製片公司佔據電影事業的大半邊天，以上海為中心，崑崙和文華是兩家較具規模的私營電影製片公司。當時的上海電影事業還在國民黨政治集團的統治之下，

對電影的審查經常被理解為壓抑創作自由，強制刪剪和禁映更是被大眾理解成「閹割」、「抹殺」、造成電影文本的「缺失」。本書關注的是這些「缺失」的文本，如何經由翻譯、改編、翻拍等藝術創新的形式呈現在大眾視野中。